



[教师节·背影]

难忘恩师三春晖

□ 戴永夏

追忆张蕾教授

我认识张蕾教授,是在1962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以后。那时,他跟冯中一先生一起,给我们上习作课。他为人豪爽,豁达乐观,学识渊博,讲课生动、风趣,很有亲和力,所以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课。又听说他擅长写杂文、随笔,文章常见诸报刊,在省内外颇具影响,这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仰慕和尊敬。然而,彼时我却未能很好地向他讨教。客观上,当时强调“政治挂帅”,专心钻研业务会被斥为“走白专道路”“修正主义苗子”,因而除了正常上课(课堂上也讲“突出政治”)外,课余时间是不兴切磋学问的。主观上自己当时上进心差,求知不主动……正当学习上有点入门的时候,社教运动来了,我们被派到农村搞了8个多月的社教。社教结束不久,又遇上“文革”,平静的校园成了斗、批、改的“战场”,知识、学问都成了“罪恶”,一向受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便成了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……这时你就是想学知识,也是求师无路、访贤无门,难于上青天啊!

真正有较多的机会受教于

张老师,是在毕业十多年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。那时,我刚到出版社工作,干业务和做学问都还比较生疏,而当时张老师就住在尚未改造的经二纬二路旁,离我们单位较近,所以,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,我总爱跑到张老师家,跟他聊聊,向他讨教。记得当时他经常告诫我,一是要多读书、勤练习笔;二是做学问要有主攻方向,博中求专。前者对我非常重要,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书学习,恶补了一下荒废十多年、知识极端贫乏的头脑;同时坚持练习写作,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……对于后者,由于我懒于搞专门研究,并未认真去做,所以至今学识浅薄,不博也不专。这以后,我写了文章,或有什么创意,总爱先让张老师知道,听取他的意见。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听我“唠叨”,给我指点,帮我把关。这一习惯,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。尤其是当我的新书出版后,张老师给予我的鼓励和帮助,更令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2005年,我的散文集《片羽寸心》即将出版。考虑到张老师长期对我的恩顾和关心,我便请他为该书写序。那时他已年近八十,年老体衰,还有病在身,我本想不让他过度劳累,只一般性地指指方向、提提意见即可。没想到对这本近30万字的书稿,他不但从头到尾、逐字逐句地仔细读过,还作了详尽而又中肯的评述。我深知,由于老师对我的厚爱,难免会有过誉之词、拔高之语,对我的散文存在的缺点也谈得不够,但我更懂得老师的一片苦心,他是在激励我,鞭策我,“应在随遇而写的基础上再升华一步”,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!

张老师对我的影响,不只是言传,更在身教。他常在理论上

给我以指导,在行动上又为我做出榜样。教学之余,他一直笔耕不辍,不但写出大量有影响的杂文、随笔,还先后出版了《文章写作指要》、《写作心理学》、《济南名泉》等学术专著和《斜阳居杂缀》等自选文集,以其硕果累累的创作实践,对我们进行无声的教诲。这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,是《济南名泉》一书的写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所在的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宣传地方文化的“潇洒济南丛书”。因为作者要求是文史专家,我便约请张蕾老师撰写《济南名泉》一书。就学术水平来说,张老师当然颇能胜任。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,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以内。这意味着,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一新任务。当时,他的教学任务很重,平时没有空,他便利用课余时间、节假日休息时,研读了《历城县志》、《章丘县志》等大量志书典籍,并多次向严薇青、徐北文等熟悉济南的学者请教。不仅如此,他还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他认为:“济南的泉,今天和往昔大不一样,必须一一地去查看,不仅要写出往昔的神采,还要写出今天的风貌。”于是,他又带上助手金翠华教授(即另一作者胡偕华,当时为大学讲师),几乎走遍了济南的大街小巷,对市内的大小泉池一一进行查看、探访,掌握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。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努力,终于写出文字严谨、资料翔实、考据充分、文采斐然的《济南名泉》。该书出版后,深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,为济南的历史文化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。

张老师的身教,还体现于他的人格力量。他一向做人低调,恭谦谦和,宽宏大量,淡于名利,

从不计个人的恩怨得失,然而,在大是大非面前,他却从不含糊。为帮助别人,他敢于挺身而出,仗义执言。上世纪70年代,张老师带学生到社会上开门办学,有一位颇具才华的同学因特立独行,深为当时的僵化环境所侧目,不但被视为“另类”,而且个别领导还要组织班组同学对其进行严厉批判。张老师闻之挺身而出、据理力争,坚决反对对这位同学进行批判和给予处分。在张老师的保护和抗争下,该生躲过了一场关乎个人前途命运的政治灾难,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,并积极努力,在教育和文学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,成为全国知名作家。

有道是“文如其人”,此言极是。张老师的人格和为人,从他的作品中也能很好地表现出来,如收在《斜阳居杂缀》中的文章,有杂文随笔,有散文诗歌,也有学术论文;有对真善美的赞美,有对假恶丑的批判,也有对亡友的思念和追忆……不管用任何形式,也不管写什么,总是那样恢宏大气、爱憎分明、情理并茂、幽默风趣,蕴含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。尤其在他写的追忆亡友的文章中,我们在了解余修、王大形、田仲济、严薇青、冯中一、孔孚等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高贵品质的同时,也看到了张老师的正直豁达、公正无私、忠于友情、古道热肠和知恩图报等闪光的品格。

如今,敬爱的张老师已经仙逝,但他的精神不死,英风长存。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!”范文正公的这一赞语,我想用在张蕾教授身上,也不为过吧?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济南出版社编审)

[教师节·忆旧]

文亭湖畔,那蹒跚的身影

□ 刘谓福

教师节即将来临,我谨以此文祭奠恩师刘德溥先生逝世50周年。

不记得有多少次了,我站在合肥巢湖之滨,想到故乡县城边也有个不大不小的文亭湖,仿佛看到刘先生在湖畔蹒跚而行的身影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,刘先生是我在成武县一中读初中的代数老师,兼班主任。他中等个子,面庞黝黑;走路时,腰不灵活,有些摇摆(当年少不更事,而今看很可能患腰椎间盘突出症);不苟言笑,没有风流倜傥的风度,却有一对大而明亮,流露着聪明、和善的眼睛。

两年前,部分同学在文亭湖畔聚会时,我才确切知道刘老师早就不在人世了!我心痛了半天,才激动地给大家讲述了刘老师对我的再造之恩。

那是1959年仲春某日午饭后,我端着碗正准备离开,猛抬头间,看到刘老师提着竹壳暖水瓶前来打开水。他笑着向我招手,我马上走上前:“有事吗,刘老师?”

“我是想问你,对毕业后升学有啥打算?”

“这事自你上次班会讲过后,正巧我父亲到学校送伙食费,他不让我再升学了。”

刘老师不等我说完,就皱起浓眉,着急地追问:“为什么?怎么能这样?”

见此情景,我赶紧说:“是这样的,刘老师,我家离学校50里,不能走读,必须住校。交伙食费,家中实在有困难。还有,母亲经常生病,弟弟还小,祖父70多岁了,在山西乡下开个小商店,最近又生病,父亲是独子,近日准备把他接回来,叫我回去把这个

家支撑起来。”

“这不行。”刘老师略加思考,缓慢却坚定地说:“你的条件很好,学习好,又是优秀团员,是品学兼优生。如果不深造,不就太可惜了吗?”

“还有个原因……”

“你不要吞吞吐吐,都说来我听听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刘老师,父亲这次来,还对我说:“家里给你定了亲事,女孩是你姨父的外甥女,条件不错,只是文化低点儿,你也见过,是你姨母做的媒。等我从山西把你爷爷接回家,盖两三间房子,年前就给你把婚事办了。”

刘老师马上接过话茬说:“这可是件大事,你还小,要慎重考虑。我看,你应继续学习,不应急着成家。你不是家庭困难吗?如成家后,又会增加老婆孩子,你又没有工作,吃穿全靠挣工分,那不就更困难吗?这不只对你和家庭不利,对国家人才培养同样不利。”他把话停了一下,又自言自语:“要想法子,想办法……”转身走了。那摇摆的身影,穿过几棵垂柳树下随风纷飞的绿丝,渐行渐远。

一周后的课外活动时,我正看篮球比赛,忽听背后喊道:“刘谓福,过来!”

我立刻快步跑到刘老师面前。只见他笑眯眯地大声道:“告诉你个好消息,有办法啦!”

我脑子一时没有转过来,问道:“有啥办法啊?”

“升学啊!保送你上单县师范,是中专学校,不缴学杂费,伙食费全包,还有点助学金;三年毕业后就有份正式工作,可以教小学或初中。你看怎么样啊?”

我连应着:“好,这当然好。”

刘老师大声笑着说:“好啦,你回去吧。下边就看你如何做好父亲的思想工作了。你星期天回家,下周一还是这个时间,到我办公室来。如果你父亲还是老脑筋,我就抽时间,亲自跑你家一趟,非撬开他这榆木疙瘩脑袋不可。我这话,你一定要带给他。”

到了约定时间,我准时站在了先生面前。刘老师笑着说:“一看你这满面春风的样子,就知道问题解决了,那就简单说说吧。”

“继续上学的事,父母都同意了。”稍停,我又讲,退婚的事也说好了。

“叭”的一声桌子响,刘老师立马站了起来,激动地说:“好!那就这样定啦!送你一句古话——‘有志者事竟成’。不怕家里穷,就怕没志气。要发愤图强,学到真本事,将来干什么都成!”

回教室的路上,我反复体会刘老师的话。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,并要去努力实践他的话。后来的中师三年,我坚持苦读,又有幸考上高师;高师毕业后,又阴差阳错地被中央一家传媒单位选去,做了新闻工作。

这时,坐在我右边的女同学田孝龄突然发话了:“讲到刘老师关心学生,我也有切身体会。”

据她讲,1958年暑假后开学时,家里因按月缴伙食费有困难,就让她辍学,去村里小学做了代课老师。想不到的是,开学后的第二个周日,刘老师就来家访了。他诚恳、动情地对家长说:“你们这个女孩老实好学,是个好苗子,不应该退学。我有个办法,请生产队给孝龄解决口粮,家里给她备些咸菜之类,我找有关领导说一下,请伙房代加工一下,不收费用。这样,孩子就可以接着读书了。”后来,问题解决,孝龄重回学

校读书了。

田孝龄眼含热泪地说:“刘老师为我忙了一上午,又坚辞留餐,匆匆返校。看着他拖着病体,很疲惫地一摇一晃地往回走,我心里想,这一来一回30里路呢,他图啥?我又感动,又负疚。我暗下决心,今后再困难,也要咬牙坚持学下去。”

田孝龄没有辜负刘老师的期望。她奋发向上,坚持读完初中、高中,考上并读完大学本科。

至此,我不禁作进一步想,像田孝龄和我这样的事,一定还有很多。因为我长期远在外省,参加同班同学聚会仅有两次,还有30多人未见呢!再说,刘老师从教17年,教过多少学生,当过多少次班主任?谁能说得清楚有多少这样的事例啊!

令人扼腕痛惜的是,刘老师竟在50年前那场浩劫之初,正当四十刚出头的英年,突然殒命!但他无形的榜样力量将永远引领学生们在筑梦路上奋力向前。

(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)

